

胡曾《咏史诗》的“通俗”艺术

潘晓玲,赵望秦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2)

摘要:为了客观地评价晚唐诗人胡曾的《咏史诗》,对它的“通俗”性进行了深入分析。分析认为,“通俗”作为胡曾《咏史诗》最突出的艺术特性,既成就了它在蒙学史、文学史上的地位,又使其成为后世恪守雅文化传统者围歼的口实,使其在后世的传播过程中影响渐趋微弱,以致于无。分析结果表明,“通俗”造成的诗歌本身不可克服的艺术缺陷是其影响力渐小的内部原因,而社会教育水平的发展、受众心理的变化、小说文体的发展等,则是其影响力萎缩的外部原因。

关键词:胡曾;《咏史诗》;通俗;双面性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09)02-0066-04

晚唐诗人胡曾的《咏史诗》是第一部以咏史名集的诗集,艺术上瑜瑕互见,曾产生了广泛影响,但又备受正统文学家的指责,在雅俗文化层面有不同的际遇。作为其最突出的艺术特性,“通俗”既成就了它在蒙学史、文学史上的地位,使其赢得了广大的受众群体,又成为恪守雅文化传统者围歼的口实。在经历了宋元明时期广泛传播的辉煌之后,影响由大至小,最终渐趋于无,可谓成也通俗,败也通俗。

近年来,唐代咏史诗的研究局面不断拓展,研究深度不断加强。但对胡曾《咏史诗》的关注尚显不够,相关学术著作及论文数量较少,对其“通俗”性及由此造成的在不同文化层面的不同际遇也缺乏深入探讨。有鉴于此,本文拟对胡曾《咏史诗》的“通俗”性以及“成也通俗,败也通俗”的原因进行剖析。这不仅对晚唐文学研究有一定促进意义,也涉及到不同文学体裁的评价问题。

一、成也通俗

“通俗”是胡曾《咏史诗》最为突出的艺术特性。

“通俗”并非指内容的陋俗,而是指语言的通俗。胡曾《咏史诗》不用冷僻生涩的语句,多用白描的笔法如实地再现历史,较之杜牧咏史的俊爽明丽、李商隐咏史的绮丽幽密,显得通俗明快、浅近平易。如《南阳》:“世乱英雄百战余,孔明方此乐耕锄。蜀王不自垂三顾,争得先生出旧庐?”《褒城》:“恃宠娇多得自由,骊山举火戏诸侯。祇知一笑倾人国,不觉胡尘满玉楼”等,用浅显通俗的语言勾勒出历史的面貌。这种“通俗”性被称道,也被诟病,造成其在不同文化层面中不同的地位和结局。

“通俗”使胡曾《咏史诗》在蒙学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被当作训蒙教材广为流传。“通俗”的语言特点是胡曾出于训蒙目的而有意为之的。唐代是诗的国度,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无不入诗,以诗歌的形式创作蒙学作品成为一种时代风气。自初唐以来,此类作品不绝如缕,如李峤《杂咏》、李翰《蒙求》、佚名《古贤集》、赵嘏《读史编年诗》、杨满川《咏孝经十八章》、陆元皓《咏刘子》等均是。此外,唐代的史学非常发达,唐人极为重视历史知识的学习,而以咏史诗形式创作蒙学作品也成为一种历史教育的方式。

收稿日期:2009-03-0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8K006)

作者简介:潘晓玲(1979-),女,山东潍坊人,文学博士研究生。

胡曾《咏史诗》正是这两种文化潮流交织影响的产物。在创作咏史绝句时,胡曾有意以通俗浅白为旨归,他在序中写道:“夫诗者,盖美盛德之形容,刺衰政之荒怠,非徒尚绮丽、□瑰琦而已。……观乎汉□□(魏才)子,晋宋诗人,佳句名篇,虽则妙绝,而发言指要,亦已疏□。齐代既失规范,梁朝(文)[又]加穿凿,八病兴而六义坏,声律偶而□□(而风)雅崩,良不能也。”玩味其意,他认为前人所谓的“佳句名篇”虽然艺术性较高,但不切实用,不适合儿童诵读,遂以浅俗之笔赋为咏史绝句,以求在社会教育功能上有所“裨补”。

这些为方便蒙童掌握基本历史知识而创作的咏史诗故事性和趣味性较强,兼词语通俗、韵律流畅,比起史传原文显然易诵易记。故而一经问世,便在蒙童间广为习诵,晚唐人陈盖、米崇吉曾以浅白的语言为之作注作评。米崇吉在《续序》开头说:“余闻玉就琢而成器,人从学以方知,是乃‘车胤聚萤,孙康映雪’”。这两句引自唐人李翰编的著名蒙学书——《蒙求》。随后即说自己对胡曾《咏史诗》是“自卯岁以来,备尝讽诵”。显然是把胡曾《咏史诗》当作蒙学书来读。南宋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七一《胡曾》条云:“王衍五年,宴饮无度。……内侍宋光溥咏[胡]曾诗曰:‘吴王恃霸弃雄才,贪向姑苏醉绿醅。不觉钱塘江上月,一宵西送越兵来’。衍怒罢宴”。王衍即五代时前蜀后主,内侍宋光溥所咏之诗即胡曾《咏史诗》中的《姑苏台》。作为宦官,宋光溥能在宴会上随口吟诵胡曾咏史绝句以讽谏,当然是在年少启蒙时熟读之故。由此观之,胡曾《咏史诗》在唐末五代已成为少儿读物。至宋元明时,受众更广,陈、米评本不仅在宋代有刊印,而且有人重新以蒙学的角度进行注释并刊印行世。元人辛文房《唐才子传》卷八《胡曾传》:“作《咏史诗》……至今庸夫孺子亦知传诵”。明人杨慎《升庵诗话》卷七《胡曾咏史》:“近日儿童村学教以胡曾《咏史诗》”。明人郑文康《平桥藁》中记载了当时一位叫李淑宁的女子,熟读胡曾《咏史诗》。可谓是妇孺皆知。又兼其创作风格鲜明,后世曾有“仿胡曾体”出现,如明人杨巍《存家诗稿》卷七“七言绝”类中就有一首《题同官孟女祠效胡曾体》。可见,其不仅流传广泛,对诗歌创作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作为训蒙教材,胡曾《咏史诗》不仅盛行于中土,影响所及甚至达于东瀛。张政烺先生在《讲史与咏史诗》中曾说:“此书盛行于日本,如《经籍访古志》、《成簒堂善本书目》、高木文库《古活字板目录》

等书目中著录颇夥,有古抄本、古刊本、古活字本等等。常与注《千字文》、《蒙求》或《蒙求集注》合刻,称为《明本排字增广附音释文三注》。盖三者皆训蒙之书,性质相近,故合刻之”^[1]。

由上可见,从晚唐迄元明,胡曾《咏史诗》与蒙学的关系都十分密切,在社会上拥有广泛的受众群体,具有较强的社会影响力。而“通俗”,正是它在蒙学史上取得巨大成功的缘由。“通俗”还使胡曾《咏史诗》成为雅俗文学之间的桥梁,对通俗文学的发展亦有所推动。

在宋元讲史平话、元明历史小说、历史剧中,征引胡曾咏史诗的现象十分普遍,且引用的数量、频率远远大于杜甫、李商隐、杜牧等名家的咏史作品。宋元讲史话本、元明历史小说中,只要描写的时代在胡曾《咏史诗》吟咏的范围之内,每至关节处便加以征引,几乎成为一种定式或套路。以五种元代刊本《全相平话》(《武王伐纣书》、《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秦并六国》、《前汉书续集》、《三国志平话》)为例,可窥一斑。在五种《全相平话》中,剔除伪作及重出一首,引用的胡曾咏史诗达二十三首之多,几乎占到其咏史绝句一百五十首的六分之一。与其他诗人的作品仅被偶一引之的情形相对比,胡曾《咏史诗》在讲史话本中的分量更突出。元、明、清时期,历史演义小说大兴,文本中穿插诗歌的形式一仍其贯,引用最多的仍是胡曾《咏史诗》。较之唐代其他咏史诗作的被引用情况,胡曾咏史诗被引用的数量多,频率高,甚至有因其不够引而托名伪作的现象。如明人冯梦龙的《新列国志》中冠名胡曾和虽未冠名而确为其所作的咏史诗,举凡二十九首,实际为胡曾所作的有八首,伪作二十一首。清人蔡元放修订的《东周列国志》中,冠名胡曾之作的咏史诗共二十五首,其中伪作二十首。其他,如元明清历史剧、散曲作品中亦多有引用、套用、化用胡曾咏史诗处。在这些通俗作品中,胡曾的咏史诗几乎被当作活招牌来使用,或用来诱发读者或听者的注意力,或用来渲染氛围、推动故事情节,或用来传达小说作者的主观意旨、道德观念,在一定程度上为通俗文学提供了文化积淀与文学参照,推动了通俗文学的发展,而它本身也因之赢得了更多的受众群体。

关于这点,后世学人都给予了一定的肯定。如郑振铎曾说:“他(胡曾)的《咏史诗》能以浅近之辞,表达历史上的可泣可歌之事,像《夹谷》:‘夹谷莺啼三月天,野花芳草整相鲜。来时不见侏儒死,空笑齐人失措年’。为的是颇能谐合一般民众的口味,故

得以传诵不休”^[2]。莫砺锋认为其在雅文学范畴内艺术价值的欠缺通过俗文学的转化得到了补救^[3]。“通俗”使胡曾成为一名“真正的民间诗人”^[2],突破了精英文化阶层的束缚而在俗文化层面开辟出自己的文化天空,占有了一席之地。

可见,“通俗”是构成胡曾《咏史诗》对后世产生较大影响的重要因素。

二、败也通俗

但“通俗”也不可避免成为软肋,使胡曾《咏史诗》在意境营造、表现手段、语言技巧等方面都体现出不可克服的艺术缺陷,由此带来与古典诗歌审美规范、社会功能的背离,使其成为恪守雅文化传统的士人围歼的口实。这种“通俗”带来的艺术缺陷是其影响力渐小的内部原因。

胡曾《咏史诗》以通俗浅白为尚,背离了中国古典诗歌含蓄蕴藉的审美规范。咏史诗首先是诗,诗贵形象而忌直露,以含蓄蕴藉,隐而不露为美,而意境的典型化与意蕴的深刻化更是咏史诗艺术上成败的关键。胡曾咏史之作中不乏“用意隐然”且情韵交融、辞达理举之作,如《黄金台》、《陈宫》、《居延》、《金谷园》、《苍梧》等,因符合雅文学的审美规范而受到肯定。如《金谷园》:“一自佳人坠玉楼,繁华东逐洛河流。唯余金谷园中树,残日蝉声送客愁”。咏绿珠坠楼事。市井依旧繁华,洛河依旧东流,而佳人已逝,音容不在,树上蝉声切切,更动人心绪,倍添愁情。《苍梧》:“有虞龙驾不西还,空委箫韶洞壑间。无计得知陵寝处,愁云长满九疑山”。缅怀传说中的古代圣君虞舜,全诗深沉凝重,凄凉悲怆。这两首诗情景交融,韵味隽永,构成了或感伤、或凄迷的意境,寄寓深远,发人深省。但这样的作品并不多见,大多数作品缺乏内在风神,直白浅露者多而情志兼善者少。如同写赤壁之事,杜牧《赤壁》诗曰:“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截取一个历史的横断面,以战场遗物起兴,将历史压缩到一个戏剧性的场景中,借“铜雀台”、“二乔”事委婉道出兴亡之意,风流蕴藉,咏叹有致。胡曾《赤壁》诗则云:“烈焰西焚魏帝旗,周郎开国虎争时。交兵不用挥长剑,已挫英雄百万师”。全以史实概括,从大处着眼,虽不失凝练,但情韵不足,显然逊于杜诗,属于后人批评的“论言直遂”之类^[4]。

在表现技巧上,胡曾《咏史诗》也显得僵直呆

板,体现为意象组合缺乏反差,难以形成艺术张力。古典诗歌中,意境的形成与意象的组合方式有直接关系,最佳的组合方式是“不用或尽量少用关联词、副词等表示语法关系的词语联结,尽量不用或少用散文常规的叙述句式 and 判断句式,即不用抽象的逻辑结构和常规的语法关系,只把意象叠加在一起,达到‘词虽寂寥,而意味无穷’的效果”^[5]。而在胡曾《咏史诗》中多见常规、不佳的组合方式,如“遂使世间多感客,至今哀怨水东流”、“当时若诉胼胝苦,更使何人别九州”、“武王兵起无人敌,遂作商郊一聚灰”、“今来鹦鹉洲边过,惟有无情碧水流”、“不是子卿全大节,也应低首拜单于”等,“遂”、“若”、“更”、“惟”、“也应”等副词、关联词和叙述句、判断句比比皆是,意象组合比较平直,缺乏反差,因而很难形成蕴藉深婉的意境美和强烈的艺术张力。

“通俗”还造成胡曾《咏史诗》审美僵化等缺点。胡曾以大型组诗的形式创作咏史诗,可谓大批量制造,限于自身才力,本就难于精益求精,又兼有意通俗,使得诗意浅白,不够隽永。这体现在表现手段上,更流于熟套,审美呈现单一性特征。如胡曾经常采用“不是……争得”、“何事……却令”等句式,前两句通常描述历史故事的背景,后两句加以评论或讽刺,如《汉宫》:“明妃远嫁泣西风,玉筋双垂出汉宫。何事将军封万户,却令红粉为和戎?”《夷陵》:“夷陵城阙倚朝云,战败秦师纵火焚。何事三千珠履客,不能西御武安君?”《南阳》:“世乱英雄百战余,孔明方此乐耕锄。蜀王不自垂三顾,争得先生出旧庐?”等等皆是。这样的诘问句式虽可加强咏叹情调,鲜明地表达出某种见解,但屡屡出现就显得板滞、单调。又像“何在”、“谁为”、“谁有”、“谁料”、“争禁”、“争知”等词语反复出现,使得诗中的历史人事即便各异,但诗意雷同,内蕴相似,缺乏变化,极易形成审美疲劳,造成“开口见喉”、“千人一面”的艺术缺陷,从而备受历代诗评家诟病,称其“不耐读”、“俗下”。

此外,胡曾《咏史诗》以“通俗”为旨归,如前文所述,主要目的是为了进行历史教育,以“裨补当世”。这偏离了“诗言志”的传统功能定位。优秀的咏史作品,如李商隐、杜牧等人的咏史诗虽以历史人事作为吟咏对象,但其特质与价值主要在于通过艺术的穿透力来再现历史,抒发诗人的主观情思、人生体验或者哲理思考,其重点不在于“事”而在于“情”,是古典诗歌“诗言志”传统的延续与拓展。而胡曾《咏史诗》中更多的体现为咏史而咏史,直白浅

切,难以超越作品本身而表现出主体生命四溢的精神气质。如《乌江》一诗云:“争帝图王势已倾,八千兵散楚歌声。乌江不是无船渡,耻向东吴再起兵。”写项羽争霸失败,耻见江东父老而于乌江自刎事,基本是对《史记》中所记载的事实用诗的形式进行概括性再现,没有自己的个性见识。

可见,“通俗”造成了胡曾《咏史诗》自身的艺术缺陷,使其缺少古典诗歌应有的蕴藉之情、言外之意,导致了“神”的匮乏,而“诗无神气,犹绘日月而无光彩”^[6]。因而备受诟病,为恪守雅文化传统的士人大加鞭挞,宋人费昶说:“胡曾《咏史诗》一编,只是史语上转耳,初无见处也”^[7]。元人陆文圭说:“视胡曾《咏史》,直可唾去”^[8]。明人许学夷说:“胡曾一百首……俱庸浅不足成家”^[9]。明末清初王夫之说:“晚唐末流……胡曾者,皆夯货也”^[10]。清人王士禛说:“七言如孙元晏、胡曾之《咏史》,曹唐之《游仙》,读之辄作呕啰”^[11]。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态度越来越激烈,用辞越来越尖刻。

这种“通俗”造成的不可克服的艺术缺陷与传统士人的围歼、鞭挞,使得胡曾《咏史诗》逐渐丧失了它的魅力,其影响力也由大而小,最终渐趋于无。

三、影响渐微的其他因素

社会教育水平的发展、受众心理的变化以及小说文体自身的发展,成为胡曾《咏史诗》影响日渐衰弱的外部原因。

从晚唐以迄元明,胡曾《咏史诗》被作为训蒙教材广泛流传。在此期间,中国的教育也在不断发展,尤其是宋元明时期,教育水平提高较快,官学、私学和启蒙教育都得到了充分发展,如南宋时期的启蒙教育已经形成相对稳定的教学内容,《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等启蒙教材大都为宋人编撰或改订。教育水平的提高对教材本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胡曾《咏史诗》作为训蒙课本虽然具备一定的优点,如语言通俗浅显、韵律流畅和谐、易于诵读记忆等,但在不断发展的教育环境中仍暴露出自身的一些缺陷,如形式单一(一百五十首咏史诗均为七律)、内容单调(均为吟咏历史人事)等。而以通俗为旨归又使其立论浅切直白,缺乏深厚的内蕴与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因而一直有人质疑其作为训蒙教材的资格,如明人杨慎《升庵诗话》卷七《胡曾咏史》:“慎少侍先师李文正公,公曰:‘近日儿童村学教以胡曾《咏史诗》,入门先坏了声口矣’”。到了明

代,它逐渐被《千家诗》取而代之,《唐诗三百首》更后来居上,成为流传最广的训蒙刻本。较之胡曾《咏史诗》,《千家诗》、《唐诗三百首》等显然更具优势,《千家诗》题材更为多样(山水田园、赠友送别、思乡怀人、吊古伤今、咏物题画、侍宴应制),较为广泛地反映了唐宋时代的社会现实,《唐诗三百首》更是众体兼备(五言古诗、七言古诗、乐府、七言律诗、五言绝句、七言绝句),编法务实、篇幅适中、观点通俗、入选诗歌精美流畅,成为中国古代最成功的儿童启蒙教材。胡曾《咏史诗》则逐渐被人们遗忘。

而随着教育水平与各类文化形式的发展,人们的接受心理也逐渐发生了变化。胡曾《咏史诗》因为通俗而被宋元明讲史话本、历史小说、历史剧等通俗文学作品广泛引用,为民众喜闻乐见。但胡曾本人的历史观趋于传统,缺乏新意。随着时代的发展与社会整体文化水平的提高,趋于传统的历史观点以及浅切直白的表达也渐为人们所摒弃。其始以通俗见纳,也终以通俗见弃。

小说等文体自身的发展规律也使得诗歌的影响力渐小。胡曾咏史诗在宋元话本、元明历史小说等通俗文学作品中被广泛引用,频率极高,几乎被当作了广告招牌,但到清代的改编作品中,数量却大为减少,在新出的历史小说中更几乎销声匿迹。这其实是小说体裁从糅杂趋于纯粹的表现,表明它开始逐步摆脱对主流文化形式——诗歌的依赖而走向独立,是创作水平提高的表现,是小说观念变迁的表征之一。从唐宋传奇、宋元话本到元明小说,小说创作中诗文入呈呈现出由少至多,又由多至少的变化趋势,清代小说中入诗文的现象更基本绝迹,“该趋势超越各创作流派的界限,甚至不受文言小说与通俗小说区别的影响”^[3]。

四、结 语

“通俗”是一把双刃剑,导致了胡曾《咏史诗》在不同文化层面的不同际遇。一方面,使其社会影响越来越大,在蒙学史和文学史上都占有了一席之地。另一方面带来了不可克服的艺术缺陷,使其背离了古典诗歌的审美规范和社会功能,遭到恪守雅文化传统的士人们的强烈抵制。而外部教育环境、接受心理、小说文体发展趋势的改变,也是胡曾《咏史诗》最终淡出人们的文化视野的一个原因。

(下转第102页)

Verve on ontology of the humanities in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HUANG Zhi-jun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48,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through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comparison, analyzes the orientation of human existence and development under the situation of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under the condition of socialist commodity production, the labor forces are no longer the commodities but the basis for human existence.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determines the individual dependence and leads to the dependent development of humans. Besides, the values of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is not object-oriented but people oriented, and the human development is determined on human factor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mmodity production in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its inner structure and value orientation have great influence on human existence and development.

Key words: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commodity; individual independent; people-oriented

(上接第 69 页)

参考文献:

- [1] 张政烺. 张政烺文史论集[C]. 北京: 中华书局, 2004.
- [2] 郑振铎. 插图本中国文学史[M]. 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99.
- [3] 莫砺锋. 论晚唐的咏史组诗[J]. 社会科学战线, 2000, 23(4): 88-96.
- [4] 何文焕. 历代诗话考索[C]//丁福保. 历代诗话续编.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 [5] 羊玉祥. 古诗文鉴赏方法 21 讲[M]. 成都: 巴蜀书社, 1995.
- [6] 谢榛. 四溟诗话[C]//丁福保. 历代诗话续编.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 [7] 费衎. 梁谿漫志[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 [8] 陆文圭. 墙东类稿[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 [9] 许学夷. 诗源辩体[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7.
- [10] 王夫之. 明诗评选[M].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7.
- [11] 王士禛. 居易录[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Creative arts about HU Zeng yongshi poet

PAN Xiao-ling, ZHAO Wang-qin

(School of Chinese Literature,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2, Shaanxi,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objectively evaluate *Yongshi Poet* which was written by the late Tang Dynasty poet HU Zeng, this paper analyzes its popularity deeply. As the most outstanding feature of HU Zeng *yongshi poet*, popularity bring out the status in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 of children and literature, it was also scolded strictly by the people who abided by the elegant cultural traditions. This caused its influence becoming smaller and smaller in the future generations. The self-defect of art and the developments in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the changes of social function, the development of novel style is the within and external factors of its failure.

Key words: HU Zeng; *yongshi poet*; popularity; two-sided nature